

# 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

## 一群七年級國中生的課程觀

劉國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

### 摘要

本文探討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之間的關係及其對國中生課程詮釋的影響。研究發現，升學主義對學校、家庭、社會的影響力深遠；而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模式，以逃避考試及「找樂子」為主；另外在校園補習文化與同儕關係交互影響下，多數學生認為補習班的地位比學校還要來得重要；至於「基測」則是學生在學校課程安排下對於課程分類及詮釋的依據，由此可見學生深受升學考試的影響。最後，本文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作為課程執行人員或研究學生文化者據以為參考的重要線索。

關鍵詞：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課後補習

## 壹、前言

發起「四一〇教育改革運動聯盟」，並進而引發一連串教育改革運動的黃武雄教授，在《學校在窗外》這本書中問讀者：「孩子爲了什麼去學校？」他的回答是：「爲了打開孩子經驗世界之窗，並發展抽象能力，以便與世界真正連結」(黃武雄，2003a)。他對於學校仍以教導套裝知識爲主要的學習活動的現象，有諸多的批評。他進一步提到，冒然全面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在缺乏基層參與的前提之下，加上升學主義的枷鎖並未打開，這樣的教育改革方式是註定失敗的(黃武雄，2003b)。我們或許可以捫心自問，教育改革推動至今已經十多年了，究竟改革是「成功」或是「失敗」的呢？

從最近的一份統計數據，或許可以略窺一二。根據教育部委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設計之「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中全國補習班數目的增長情形可以發現，2004年補習班的數字尚爲8610家，經過十年後已增加至2013年的18957家，十年內足足增加了超過10000家的補習班(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2013)！由此看來，標榜著「減輕學生學習壓力」，「還給孩子快樂童年」的教育改革，不僅未讓孩子的升學壓力減少，卻反而讓孩子的課後補習活動在十多年後達到最高峰。這種補習熾盛的社會現象，確實值得深入探討(林忠正、黃瑾，2009)。

教育當局雖然不斷進行升學方式的改革，從廢除聯考改爲基本學力測驗，近日內又希望將基本學力測驗改爲會考(教育部，2013)。然而面對瞬息萬變的教育政策，學生反而必須花更多的時間準備各種多元的入學考試，以免錯失了任何一個與未來升學有關的考試內容，因此進入補習班就成爲減輕家長及學生焦慮的最有效方法(天下雜誌，2013)。研究者好奇的是，這些在課後還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在補習班中上課、複習、考試…的學生，在他們心目中，學校的課程究竟有何意義呢？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學校的課程？

近年來，學者對於課程的改革與研究，已逐漸從政策制定、組織發展等行政管理觀點，移轉到教師身上。學者所好奇的是，經過層層轉化的課程，到了執行者的眼裡，究竟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會不會早已經「扭曲變形」？或是另有一種不同的詮釋風貌(歐用生，1985)？然而，教師的觀點固然重要，那學生呢？既然近年來教育潮流與趨勢皆不斷強調「以兒童爲中心」的教育目標，而其核心概念正是「符合學生的需要」(黃政傑，2012)，那我們真的知道學生需要什麼嗎？這樣的「需要」是符應了政策制定者、利益團體、專家學者、菁英份子、家長、老師…的想法，還是，它真的代表著學生的想法？

根據相關研究表示，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模式、對於課程的分類及理解等方式，必須放置在與學生文化有某種邏輯關聯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檢視，才能產生象徵性的意義。是故爲了尋求符合真實情境脈絡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必須投身於研究場域中實地觀察、訪談，以獲取每一筆珍貴、不可或缺的資料。本研究亦然，爲進一步澄清前述的疑問，研究者實際投入國中的教學場域，從事田野的研究，以發覺一向爲人所忽視的課題：從學生的觀點來詮釋課程，並進而挖掘出爲人所不知的學生「經驗課程」，尤其是長久以來在升學主義宰制下，參加課後補習的國中生，如果他們是真正學習的主體，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倘若能從其中發現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生與學校課程之間各種複雜

交錯的辯證因素，或許能提供給課程執行人員或研究學生文化者一個據以為參考的重要線索，亦可作為既有文獻不足之補充。

## 貳、文獻探討

### 一、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之間的關係

#### (一) 升學主義與學校生活

升學主義是一種以升學績效為導向，並以此作為教育決策、分配教育資源以及學習活動與時間分配的思維模式，不僅忽視學生主體的意願、性向、才能，更往往因此而付出影響學生身心發展及違反教育原理原則等諸多代價(李政釗，2011；張郡雯、林文瑛，2003)。

臺灣的升學問題，在歷經幾次重大的教育政策頒布實施後，並未獲得有效的解決，反而以不同的形貌呈現出來。首先是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雖然讓國小畢業生皆能免除升學考試而能直接就讀國中，然而從官方報告中發現，學生補習的風氣仍然過盛，課業壓力也過重(劉正，2006)；接著是在高中、高職及五專入學方式，廢除行之有年的聯考制度，改以「基本學力測驗」，作為申請入學及甄選入學之依據(教育部，2007)，但是研究指出，國中生參加課業補習的比例仍然高達 72%，國中生每週投入補習的時間至少六小時(劉正，2006)。

在升學主義的籠罩下，國中的辦學目標也幾乎以升學率高低為努力方向，連帶使得國中生的學校生活也受到極大的影響。黃鴻文(2003)的研究指出，國中生對於學校課程的詮釋，就是以升學考試考與不考為分類的標準；在吳瓊洳(2000)對於國中生反學校文化的研究中亦發現，因為升學與否之故，學生同儕團體亦隨之區隔，甚至於產生對立的情形。

由此可知，升學主義與國中生的學校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升學主義已全面滲透到學校生活的每個層面，以致於影響到學校中的行政規定、課程安排、教學方式、師生關係及同儕文化等。升學主義桎梏一日不解除，又如何奢望國中生的學校生活能步入正軌呢？這也是本研究想釐清的主要疑問。

#### (二) 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

學校生活是學生每天生活的重心，學生不僅在此求知、學習做人做事，更重要的是，學校是學生奠定人際關係基礎的重要場所(劉國兆，2009)。國中生在學校的生活模式，受到學校制度、師生關係、教學方式、課程活動及同儕文化等的影響及規範(吳瓊洳，2000)。為了能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學校設定了許多的制度，希望透過正式教育以及潛在教育，促使學生學習；另外 Schmidt(1992)的研究發現，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會影響學生學校生活的滿意程度；至於教師的教學方式，則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態度；而課程活動的安排，如果無法切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也會讓學生覺得學校生活「索然無味」；最後提到同儕文化，同儕關係已凌駕於學校之上，成為青少年生活的核心(Ogbu & Fordham, 1986)。

原本應該以學校生活為主，課後補習為輔的運作方式，在孩子補習科目及時數日益

增加的情形之下，反而讓兩者之間的關係產生「主客易位」的疑慮。在父母對於子女高度的教育期待之下，爲了讓子女保持一定的競爭力，父母視補習爲重要的教育投資，因此在父母主動積極的態度促使下，補習不僅成爲子女的生活重心，同時也占去絕大多數的課後時間(邱永富，2002)。多數父母認爲，參加課後補習對於子女學業成績的提昇有正面的助益，於是無論家庭收入的高低，父母競相將孩子送往補習班(劉正，2006)。也使得國中生的課業負擔，除了學校以外，還增加了補習班的作業及考試。然而，一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學生爲了同時應付學校及補習班二者的要求，有時候也只能利用課堂時間來完成補習班的功課等(邱永富，2002)，甚至因此而影響到學校中的師生關係、課程活動及同儕文化等。

由於課後補習的興盛，影響到國中生的學校生活，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究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呈現出國中生學校生活的真實樣貌。

### (三)升學主義與課後補習

課後補習是發生在學校正常上課時間以外，並以升學爲目標的學習活動，也是一種使用者付費的交易行爲(林忠正、黃瑾娟，2009)。雖然政府在近十年來已廣設高中、大學，尤其是政府爲擴大大學就學機會，除積極鼓勵私立大學設立外，並且讓技術學院或專科學校升格爲院校，大專院校總數由1982年的99所，到2008/9年時已高達162所(教育部，2009a)，總學生數爲1,337,455人(教育部，2009b)，而大學考試的錄取率亦達到96%(林志成，2007)。然而升學主義的風氣並未因此而稍減，反而因家長希望孩子考上明星高中、公立大學，讓補習班的數量也跟隨著父母的期望而快速增加(黃毅志、陳俊瑋，2008)。

究竟參加課後補習對於學生學業成績的提昇真的有正面的助益嗎？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的研究發現，國初中與高中職階段，參加補習的項數愈多，則日後升學的機率愈高；巫有鎰(2007)研究國小學生學業成就影響因素，林大森、陳憶芬(2006)研究臺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兩個研究都指出，參加課後補習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業成績。由於多數研究都認爲參加課後補習與提昇學生的學業成績之間具有正相關，似乎也爲學生參加課後補習提供一個合理的基礎。不過，黃毅志與陳俊瑋(2008)的研究提醒家長及學生，補的科目若過多，除了帶來過度的疲勞，降低補習效果之外，還會佔用到許多複習功課與做作業的時間，因此反而會降低學測總分；另外關秉寅與李敦義(2008)的研究也指出，愈想去補習者、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和數學先備能力愈強者，其補習效果反而有限。

然而，爲了考取好學校，以占據升學的有利位置，參加課後補習似乎已成爲之間的橋樑，於是在這種升學主義爲因，課後補習爲果的因果邏輯關係下，國中生以「補習」作爲主要的「課後活動」的現象也就成爲一種「見怪不怪」的常態。

### (四)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

綜合以上所述，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一種相互拉扯的緊張關係。由於升學主義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於校園中，並且幻化成各種變形，因而主宰了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步調與節奏，不僅影響了學生下課後的生活方式，更讓升學主

義帶動下的課後補習熱絡景象，愈發熾熱起來，也讓國中生的學習活動，從學校延伸到補習班，日復一日，週而復始。

以蔡碧峯(2008)的研究發現為例，在升學主義氛圍籠罩下的國中生，仍然是以考試與基測作為課程分類的標準，並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三的學生參加課後補習活動，且以「主科」為主要的補習科目，也因此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安排，受到雙重的壓縮，既要應付學校課業，還得兼顧補習班的要求。林忠正、黃瑾娟(2009)研究補習文化後，則認為當課後補習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及文化時，雖然大家普遍認為學生在升學主義作祟下壓力過大，已造成身心健康傷害等問題，且嚴重影響學生在校及在家的生活品質，但是，大部分家長仍然把學生送往補習班，並抱持著「不補習可能會更差」的心態。

由此可見，升學主義、學校生活與課後補習之間的鏈結關係，確實緊緊地扣連在一起，既難分也難解。而破除之道，恐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 二、國中生的課程觀

學科中心課程觀的所有思考是從學科出發，故課程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生進入學科領域；至於社會中心課程觀則認為，學校的存在是為了服務社會，因此必須以社會利益為第一優先，故課程設計必須藉由社會的分析，取得目標和內容；而本文所強調的是學生取向的課程理念，又被稱為兒童中心的理念，此種課程理念，強調學生個人的意義創造(黃政傑，2012)。

因此學生的課程觀是從學生主體出發，強調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詮釋及其採取的行動(蔡碧峯，2008)。然而有關學生對於學校課程詮釋的研究，向來少之又少。或許是課程改革與研究才剛開始移轉到教師身上，但尚未能迅速擴及到學生之故。早期的研究從學科知識的觀點探討學生對特定科目知識的知覺、理解或認識論，發現學生的觀點與教師或學科知識並不一致。近來的研究受到社會學、人類學及語言學等衝擊，重視課程的社會文化脈絡，並將課程與學生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作連結(武曉梅，2004)。

在 1960 年代末期，新教育社會學興起，開展了學校課程社會學的討論。學校課程不再被視為價值中立，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建構(Young,1971)。美國新教育社會學先驅 Apple 對於學校課程的政治中立性有諸多批評，Apple(1990)認為學校不只「處理人」(process people)，學校也「處理知識」(process knowledge)，它們就像文化與意識型態霸權的代理人一樣，挑選某些知識並定於一尊。因此，學生對於課程的看法，必須放置在整體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檢視，才能理解其真正意涵。

從相關研究發現，學生對於課程會進行分類，以區分「重要」與「不重要」的課程，並藉此快速而有效地掌握到學習或考試的訣竅。以國內的研究而言，黃鴻文(2003)研究國中生的文化，研究中發現，在以該科目是否與升學有直接相關的前提下，學生將課程區分為主科、背科、聽得懂的、聽不懂的、老師會處罰的、老師不會處罰的。這樣的分類方式，顯然與臺灣長久以來牢不可破的升學主義有密切關係。再以林金葉(2010)研究臺北市公立高中學生對公民與社會科的課程詮釋為例，研究發現多數學生認為公民與社會大多數的主題具有實用性及趣味性，然而對過半數的主題感到困難，而多數學生則認為公民與社會科為「非主科」，並贊成將其列入指考科目。而這樣的詮釋方式，其實仍

趨向於以考試與否作為課程分類的依據。

在國外的研究方面，Schug、Todd 與 Berry(1984)研究學生為什麼不喜歡社會科，發現學生不喜歡社會科的原因，是因為社會科不是學生所喜愛的科目，且對於未來生涯發展等沒有助益。而 Fouts (1989)的研究指出，學生對於社會科的看法，受到教室環境氣氛及教師教學方法的影響。另外 Wexler (1992)的研究則發現，學校生活比課程來得重要，因為對於當地學生而言，「成為某人」才是在學生的生存之道，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上課及學習等各種學校正式活動。

前述的課程分類方式，與學生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對於課程的詮釋具有密切的關連。以國內的研究而言，白潔瑩(2008)分析參加人文社會科學資優課程的學生對於課程的詮釋與看法，發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中，學生獲得發聲的機會，但其聲音仍然是較微弱的，且學生的發聲權還是掌握在課程設計者，或是教師的手中，由此可以看出，學生對於課程的詮釋，仍受到結構的束縛，不過仍可以看見學生能動性的開展。陳靜怡(2008)探討國中學生對國語文課程詮釋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對於國語文課程的詮釋，受到自身社經文化背景及家長期待的影響，因此多數學生雖然知道國語文對於未來升學及工作有幫助，但卻又認為國語文不重要，主要是因為這所位居鄉下的國中學生，對於未來升學及工作並沒有多大的期待。

在國外的研究方面，Willis(1977)研究英國勞工階級學生的文化中發現，lads 認為學校課程是無用的，並形成非正式團體，敵視教師與乖學生，並把女生當成「性對象，是沒有用處的」，而這樣的文化形成，對照於勞工階級學生從小到大所生長的社區工廠文化，就可以理解出其中的意涵。而 Ogbu 與 Fordham (1986)的研究則指出，美國黑人學生認為學校課程是白人文化的產物，在社會結構不平等的體制中，他們發展出「仿效白人」、「忽視學業成績、成為運動員」、「取悅同儕」等不同策略，來應付學校生活中不同情境的需要。

由前述分析可知，學生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主體，在面對學校課程時，他們並非照單全收，而是透過對課程的分類、詮釋並賦予獨特的意義後，繼而採取特定的學習活動。對於本研究的啟發，就是要深入到社會文化脈絡中去理解學生的課程觀，才能以務實的态度提供課程改革的有效策略。

###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根據文獻探討結果，以臺北市名譽國中七年 A 班(化名)38名學生及任課老師為研究對象，之所以選擇名譽國中的原因，是因為名譽國中是當地的明星學校，以升學率高著稱，家長的社經地位一般皆在中上，學生越區就讀的比率高。附近各式各樣補習班林立，學生放學後，可以看見學生魚貫進入補習班上課的熱鬧景象。

學校為了獎勵學生的考試成績，特訂定「成績評量獎勵辦法」，除定期公佈「定期評量成績優秀學生名單」外，並張貼於學校穿堂佈告欄，公佈名單每班七名，全年級共一百九十六名，並給予獎品或獎狀的獎勵。至於成績計算採計的科目為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不含生活科技)，各年級另依開課節數加權，採加權總分。

而研究者之所以選擇七年級，是因為七年級學生剛從國小畢業進入國中，國小與國

中雖然同屬於九年一貫課程架構，但是卻是完全不同的學習情境，故研究者想要探究七年級學生究竟如何適應此一以升學為導向的學習環境。

七年 A 班共有學生 38 位，男生 19 位，女生 19 位，老師採取男女相鄰之梅花座之座位安排，每週更換一次座位。班導師年輕自信有活力，對於班級經營有自己的看法與作法，與學生互動不錯，惟因為嚴格要求服裝等，所以也有學生認為他很囉嗦。對於考試未達標準的學生，會施以打手心的處罰。

研究者觀察的課程為數學、體育、國文與生物，每節課為 45 分鐘，下課時間為 10 分鐘，上課的教材為審定本教科書，觀察期間的考試分別為：定考(定期評量)、小考(分為測驗卷跟作業本兩種)，另國文課還要寫學習單(整本測驗卷)。本研究進行時間從 2010 年 9 月中旬開始至 2011 年 1 月學期結束。

## 一、研究方法

### (一)教室觀察

研究者在研究期間內所進行每週 1 次的教室觀察，是在每周三上午，依序是早自習、第一節數學、第二節體育、第三節國文與第四節生物，每次 4 小時，共計 15 次，合計 60 小時。教室觀察的重點，是依據研究目的而擬定，以了解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及其與升學、課後補習之間的關連。

除上課觀察外，研究者亦利用下課時間廣泛蒐集師生、同儕互動及老師不在教室時學生的行為表現等資料，並加以詳實的記錄。進而將前述觀察資料彙整分析後，找到上課及下課時發生的關鍵事件、事件的參與者、參與者說的話及行為反應等，並將觀察時記錄下來的疑問，作為訪談問題的切入點。

### (二)訪談調查

研究者從 2010 年 11 月開始以立意取樣的方式，從 27 位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生(男 15 位、女 12 位)中挑選 8 位(男 4 位、女 4 位)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生，進行非正式訪談，選擇的主要考量為：學生家庭社經地位水準、性別差異、級任導師推薦、學生上課的行為及成績表現等因素；另為瞭解未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生與其之間是否具有差異性或相似性，另從 11 位未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生(男 4 位、女 7 位)中擇 4 位(男 2 位、女 2 位)接受訪談，選擇的主要考量如前所述，前述受訪學生，每次訪談約 10~30 分鐘不等的時間，共進行約 32 人次，受訪者接受訪談的總時數共 10.5 小時。並於 2011 年 1 月下旬進行 2 次報導人(從參加課後補習的受訪學生中各挑選男女 1 位)的正式訪談，每次訪談約 1.5 個小時，合計 6 小時，至於報導人的挑選，是研究者與學生互動後，從中發現可以提供研究者更充足之資訊者，並加以標註，以利研究者檢核其資料與其他受訪者之異同。

訪談大綱是依據研究目的而擬定，主要想了解受訪者對於升學、課後補習、學校上課、與老師的互動、與同學的相處等想法，並以半結構式、開放性的問題，針對參加課後補習與未參加課後補習學生提問，以比較差異性。每次進行訪談後，隨即標示已提過的問題、待訪談的問題、待澄清的問題，以利於下一次的訪談。訪談結束後會立刻安排下一次訪談時間，並在第二次訪談實施前，先回顧前次訪談的摘要，在最後一次訪談結束後，另擇時間請受訪學生檢視訪談紀錄是否與其意見表達一致，並作必要之修正。為

求研究的正確性，本研究以「三角檢驗法」、「反饋法」、「成員檢驗法」，反覆檢驗資料之真實性。

## 二、資料分析

### (一)教室觀察

研究者將所觀察的數學、體育、國文與生物課程分別以「M」、「F」、「C」、「B」作為代號，上課時間以「1」作為代號，下課時間以「2」作為代號，並註明觀察次數(如：M-1-1，為數學課上課第1次觀察紀錄，C-2-10為國文課下課第10次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所得資料，除加以摘要、闡述、詮釋，以找出主旨與趨勢外，並與研究目的相互連結，以作為訪談資料分析的重要參考。

### (二)訪談調查

研究對象之編碼，參加課後補習的男學生以「B1」作為代號，女學生則以「G1」為代號；未參加課後補習的男學生以「B2」作為代號，女學生則以「G2」為代號，並註明受訪次數(如：B1-1-1，為參加課後補習、編號1的男學生接受第1次訪談)。

受訪學生之背景資料中，其家庭社經地位乃對照黃毅志(2003)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五等量表加以分類(由高至低依序為五、四、三、二、一)，而補習情況則依據實際補習科目、起迄時間及補習時數加以整理，至於定考名次則為該班級任導師所作之統計表，彙整後如表1。

表1

受訪學生之家庭社經地位、補習情況及定考名次之背景資料表

代號	編碼	受訪次數	家庭社經地位		補習情況			定考名次			備註
			家長職業	五等社經地位	補習科目	起迄時間	每週補習時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吳生	B1-1	4	企業主管	五	英、數	上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	6	3	2	5	報導人
楊生	B1-2	3	小學教師	五	英、數、 作文	上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	8	5	5	3	教職員子女
許生	B1-3	2	固定攤販	二	英、數	從第一次定考後至學期結束	4	21	18	15	
鄭生	B1-4	3	會計	四	英、數	上學期開始至學期結束	6	10	9	9	
劉生	B2-1	2	律師	五	無	父母及自己都認為補習是沒有必要的，且會浪費閱讀及學習時間	0	2	1	1	
廖生	B2-2	2	清潔工	一	無	上學期曾經補習過2個月，因經濟因素，故中途停止	0	23	27	29	

(接下頁)



(接前頁)

代號	編碼	受訪 次數	家庭社經地位		補習情況			定考名次			備註
			家長 職業	五等社 經地位	補習 科目	起迄 時間	每週補 習時數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丁生	G1-1	4	醫師	五	英、數、 鋼琴、家 教	上學期開始 至學期結束	10	1	3	2	報導人
王生	G1-2	3	中小學教 師	五	英、數、 作文	上學期開始 至學期結束	10	7	6	4	
游生	G1-3	2	中小學教 師	五	英、數	上學期開始 至學期結束	6	8	10	7	教職員子女
葉生	G1-4	2	補習班教 師	四	英、數	上學期開始 至學期結束	4	13	15	11	
高生	G2-1	3	售貨小販	一	無	母親認為女 孩子不需要 補習，只要 用功唸書 就好	0	30	31	30	
蔡生	G2-2	2	餐飲服務 生	二	無	曾經考慮過 上補習班， 但是父母後 來還是決定 先不補習， 以後再說	0	33	33	3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訪談所得資料，將進一步分類、篩選，並找出相似性、關聯性、差異性以及共同性等，再加以系統化後，歸納出通則，以提出本研究之理論觀點(張芬芬，2010)。

### 三、研究倫理

爲了遵守研究倫理的行為規範，本研究在班級導師的協助下，事先徵得學生家長及受訪者的同意後進行訪談及錄音，並充分告知研究目的及受訪者的權利，對於受訪者個人資料並予以保密，另訪談資料也將以公正合理的態度加以分析運用。

###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綜合觀察、訪談等資料，從相關理論及社會文化脈絡等因素，加以分析後，提出如下之研究發現：

#### 一、升學主義對學校、家庭、社會的影響力深遠

臺灣社會深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文化影響，教育除了可作爲提高職業、收入的工具外，其本身也代表著很重要的社會地位，甚至於比職業、收入還要重要(黃毅志，2000)。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中，形成「文憑主義」及「升學主義」。

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下，爲了取得一張值錢的文憑，成績的好壞當然具有絕對性的影響(林大森，2002)。因此，臺灣社會雖然歷經一波波的教育改革，但是仍然難以撼動升學主義根深柢固的體制，頂多是改頭換面，換了個名稱罷了。就算只是國中生，但他們

也知道爲了找到好工作，所以必須考取好學校。學生表示：

吳：唸英文才可以跟外國人溝通…我以後想當個汽車設計師，所以要好好唸書，考到好學校，  
 才会有像樣的工作(B1-1-2)。

丁：我想當空姐，不過我不喜歡幫別人倒茶、服務什麼的…不過當空姐也要有好的學歷…  
 (G1-1-3)。

劉：…我爸是律師，他是台大畢業的…我也要念台大，所以我一定要上建中…(B2-1-1)

又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在臺灣，補習是影響民眾教育年數、升學與否的最重要影響因素，參加愈多補習的人，教育年數愈高，在各升學階段的入學機會也愈大(黃毅志、陳怡靖，2005)。於是，爲了讓孩子未來可以唸好學校，家長當然拼命把孩子往補習班送。學生表示：

楊：媽媽要我補的呀，補習會讓成績比較好(B1-2-2)。

鄭：是我自己想補的，我從小六就開始補英文，媽媽說補習班的英文教的比較快(B1-4-2)。

在升學主義脈絡下的名譽國中，一切以升學爲導向，不僅造就了「人情班」，教職員的子女也會優先安排進入該班，還訂有「成績評量獎勵辦法」，並定期公佈「定期評量成績優秀學生名單」外，另外也有全校定期評量排名的制度，學生在考試後，就會知道自己的全校排名(學生稱之爲校排)，在校排的推波助瀾之下，養成學生彼此競爭的心理。因爲學生已經會從校排中去推算，自己未來可能會唸那一所高中。學生表示：

游：我媽媽也是學校老師…她可是想盡辦法才讓我分到這班…當然要好好唸呀(G1-3-1)

王：我最怕「校排」了，實在很殘酷(G1-2-2)。

丁：我上次才考班上第三名，有兩個人贏過我，我下次一定要「幹」掉他們…否則…就沒辦法  
 上第一志願(G1-1-4)。

在升學主義的籠罩下，社會、學校及家庭皆深受其影響，也讓國中生在面對巨大的升學壓力，並受到社會、學校及家庭整體影響之下，以選擇參加補習班，來做爲通往升學途徑的必要管道。研究者統計七年A班學生參加課後補習的比例爲71%，與劉正(2006)的研究發現中「國中生參加課業補習的研究比例爲72%」，二者頗爲接近，然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還是有學生在家庭經濟允許的條件下，選擇不參加補習，學生表示：

劉：爸媽和我都認爲補習是沒有必要的，爲什麼要浪費時間把學校學過的東西再學一次呢？無  
 聊(B2-1-2)！

可見，學生仍有其相對自主的選擇權(父母都支持)，但是，令人憂心的是少數社經地位低的學生，在校成績落在「後段班」，家長也都知道惟有考取好學校才有機會讓下

一代的階級翻身，但是囿於經濟資本有限，故只能讓家中的其中一位(通常是男生)上補習班，或是曾經補習卻中途停止，或者是根本就無法參加補習。學生表示：

高：我媽媽說女孩子不需要補習，只要用功唸書就好…反正，哥哥的成績比較差，他去補習也對啦…(G2-1-2)

蔡：…曾經考慮過上補習班啊，但是爸媽後來還是決定先不補習，以後再說…(G2-2-1)

雖然巫有鎰(2007)及林大森、陳憶芬(2006)的研究都指出，參加課後補習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業成績，但是，在一般家長社經地位皆在中上水準的學校中，課後補習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誰會想到這些處境艱困的家庭的需要，而且，這些「需要」正是升學主義造就的產物。

## 二、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模式，以逃避考試及「找樂子」為主

這群七年級國中生，大部分的人必須在下課後到補習班上課、複習、考試等，因此有的學生從早上七點鐘就已經出門，往往必須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能回到家，雖然大部分的學生都表示已經「習慣」了，但「習慣」不代表「喜歡」，也不代表「不累」，長此以往不斷地消耗體力與精力，無怪乎學生必須找到可以抒發的管道或窗口，而他們在學校的生活模式為何呢？以下分爲二個部分加以探討。

### (一) 上課伺機睡覺、找樂子，下課利用時間看漫畫、玩遊戲

這些學生中有大部分的人，一天中有十五小時左右的時間在學校及補習班中度過，甚至於連假日也無法完全休息。學生表示：

許：早上七點就出門了呀，晚上補習班下課後回家已經十點多了(B1-3-1)。

楊：星期二、四、五都補，到九點…，最近星期六加補作文(B1-2-3)。

鄭：…每週三要補習數學，每週六要補習英語…(B1-4-1)

而學生對於「白天在學校、晚上(甚至於假日)在補習班」的生活方式，似乎已習以爲常，大多表示「習慣了」或「還好」。但是，學生表示「習慣」或「還好」的態度或想法，卻無法爲他們在課堂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爲提供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學生晚上補習過後回家，往往還得寫學校的作業，等到洗澡、上床睡覺時往往已經是凌晨一、二點了。因此學生在學校上課時，往往累得趴在桌上睡覺。

以下爲觀察發現：

廖、高、鄭生趴在桌上睡覺，游生則猛打呵欠並伸懶腰(B-1-3)

學生表示：

鄭：…很累…，沒辦法，昨晚補習班的考試考不好，罰寫到一點多才睡覺(B1-4-3)。

游：昨天晚上補習完回家就十點多，再拿出學校的考卷及作業…到兩點才睡…(G1-3-2)

由於補習班會先教學校的課程，甚至於連學校小考的測驗卷都與補習班的一模一樣，同樣的課再聽一遍，同樣的考卷再寫一次，就算可以拿高分，學生還是會覺得無聊，所以，想辦法在上課時間「找樂子」，就成為學生在學校生活的主要樂趣。以下為觀察發現：

廖生上課傳紙條給王生，王生打開紙條並放在抽屜裡看，並抿嘴笑了起來(M-1-4)

學生表示：

王：告訴你，我們上課的考卷其實在補習班已經寫過了，但是要裝作沒寫過一樣(G1-2-3)

楊：再聽一遍很無聊…反正自己會想辦法找樂子，反正老師不生氣就好(B1-2-2)

不過覺得上課無聊的學生，也包括沒參加補習的學生，有的表示「很簡單」，有的表示「反正聽不懂」。學生表示：

劉：我覺得這是老師講給大家聽的…我覺得太簡單了…(B2-1-2)

廖：…很難，算了，不會就不會…(B2-2-1)

而學生「找樂子」的行為，通常發生在特定的課程中，而且往往在課程一開始的時候，就有某些特定的學生會「發動」一連串的行動。學生表示：

丁：我喜歡生物課，同學會跟老師開玩笑…像說什麼「老師，課本自己會打開」的話…(G1-1-2)

高：我覺得有的人很敢勒，會跟老師說「老師，妳好漂亮！」、「老師，讓我們睡一下」…要是我就不敢耶…(G2-1-3)

學生在課堂中，也常見彼此開玩笑、捉弄，甚至於拿玩具出來玩等行為。以下為觀察發現：

楊生將紙飛機射向許生，被許生撿起來射回去(C-1-6)

學生表示：

葉：有一次玩太過頭了…同學把球丟到講台上…那一次生物老師發了頓大脾氣(G1-4-2)

上課的情況是如此，那下課呢？其實下課對某些學生而言，或許才是他們到學校來的主要目的吧？下課雖然只有十分鐘，然而對學生來說，可是分分秒秒都是珍貴無比的。有部分的學生最常做的事就是拿出漫畫來仔細地欣賞，看到忘情處，還獨自哈哈大笑起來。以下為觀察發現：

丁、蔡生拿出漫畫看得入神(M-2-7)

學生表示：

吳：下課最好…看漫畫(B1-1-4)

就連游泳課後，在上課覺得昏昏欲睡的學生們，聽到下課鐘聲一響，也都立即「清醒」過來，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或在玩「鬼抓人」的遊戲。學生表示：

蔡：…下課才十分鐘，一定要把握時間…(G2-2-2)

廖：…玩「鬼抓人」啊…(B2-2-2)

綜上所述，學生在學校裡會以睡覺來打發無聊的上課生活，或是和特定對象的老師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或是同學彼此打鬧等來尋求生活中的樂趣，到了下課則又把握分秒時間，看漫畫、聊天、玩遊戲…，這些舉動或許就是他們每天忙碌生活中唯一的「娛樂活動」吧？前述研究發現也驗證了 Ogbu 與 Fordham (1986)及 Schmidt (1992)的研究結論，當學生覺得學校生活索然無味時，同儕之間的互動就會成為青少年生活的重心。

#### (二) 不斷和老師進行「磋商」，爭取延後或不考試的機會

雖然只是國中初期階段的七年級，但是考試的次數卻不少，尤其是定考快到的前兩個禮拜開始，每天考試的科目加起來最多有高達五科以上的，這些考試對學生造成不小的壓力。學生表示：

丁：定考前二週是「魔鬼週」…最多一天可以考八張考卷，考不完，中午也在考，自習課也在考…(G1-1-3)。

高：…老師還說「考試，是一種磨鍊」…他自己怎麼不考看看…(G2-1-2)

面對大大小小的考試，學生也並非都「逆來順受」，他們會嘗試著向老師提出「哀求」，希望能減少考試的次數，或是藉由提出問題，讓考試無法順利進行。而老師通常也會給予善意的回應，包括將考試型式改變、或延後考試時間等。學生表示：

王：生物老師最好了…你只要跟她撒嬌，她通常都會說「好啦，下不為例，那明天考吧」(G1-2-1)。

吳：每次國文課只要考試，同學就會不斷問問題，老師就會開完笑地說「奇怪，怎麼說到考試就有問題？」(B1-1-3)

其實，根據實地觀察，考試的次數並沒有因為學生的要求而減少，只是因為表面上老師「讓步」的舉動，讓學生覺得自己提出的要求獲得老師重視，故認為已經達到「目的」而高興不已。可見，在課堂中擁有「絕對權力」的老師，只要能對學生的磋商或協

議給予「善意」的回應，學生就會有不同的感受，也會更加認同老師。因此蔡榮貴、林士乾(2006, 頁 143)針對國小五年級課堂內師生權力關係的研究中提醒我們：「師生關係的建立，取決於師生互動過程中對彼此價值的體認」。

### 三、在校園補習文化與同儕關係交互影響下所塑造出的補習班地位

#### (一)校園補習文化與同儕關係交互影響下所形塑出的補習班重要性

除了升學主義的影響外，學生的補習風氣為什麼在教育政策不斷改革後反而愈加地熾盛？究其原因，在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及個人偏好等幾大條件的結合下，補習已成爲社會文化的一部份，而補習也成爲一種追求成功、培養專長、尋求機會、厚植實力的資本累積過程(林忠正、黃瑾娟，2009)。就在前述條件的帶動下，補習彷彿變成一種全民運動，學業、語文、才藝…樣樣都得補習，尤其是社經地位愈高者，參加補習的動機愈強(關秉寅、李敦義，2008)，對照於 Bray(2003)所作的跨國研究可以發現，在香港、韓國、新加坡等國亦出現同樣的情況。

除了校園補習文化的社會結構因素外，同儕關係亦是造成學生補習風氣盛行的另一個原因。當團體成員大多數都補習而自己沒有補習時，則可能漸漸受到疏離，造成自己被同儕團體排擠或孤立(林忠正、黃瑾娟，2009)。學生表示：

蔡：…我覺得我好像沒有朋友…她們都在說補習班如何如何，但是我沒有補習(G2-2-3)

廖：…算了吧！反正他們不會把我當成他們的咖…(B2-2-2)

於是，就在校園補習文化與同儕關係交互影響下，補習彷彿成爲同儕流行文化的代名詞，不補習不僅落伍，還代表著社會地位的懸殊差異，就在這樣的氛圍下，補習班的地位也就愈形重要。

#### (二)補習班的考試及作業比學校重要

學生上補習班的本意爲何呢？根據我國進修與補習教育法規定：「補習與進修教育，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社會進步爲目的」由此可知，補習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補充」，意即社會某些成員因「缺乏」適應社會生活的知識，故需要透過補習教育「補充」所「缺乏」的知識(武曉梅，2004)。然而，真實的情況卻與此相去十萬八千里。

長久以來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氣氛下，許多的學習內容都只以升學爲導向，考試成績高低變成學生及家長最在乎的事，學到什麼並不重要，升學考試會不會考才是重點(王震武、林文瑛，1994；黃政傑，1994)。所以學生及家長關心的並非學會適應社會生活的知識，而是學會升學考試的內容。爲了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家長當然想盡辦法將孩子往補習班裡送。

原本學生上補習班的用意，應該是「補充」學校上課授課內容不足之處，所以，學校與補習班的從屬關係，大抵爲「學校爲主、補習班爲輔」的主從地位殆無疑義。惟學生在補習班上課後，反而常因考試、作業太多，無法在家寫完或準備好考試內容，竟然

「反客為主」，利用學校正常的作息時間寫補習班的作業或是準備補習班的考試，甚至於連上課時間也被拿來使用。以下為觀察發現：

楊生在國文課拿出補習班的「作文範本」，低頭猛寫，連頭都沒抬起來看老師一眼(C-1-8)

學生表示：

游：沒辦法，寫不完的話補習班老師會打人…很痛耶…(G1-3-2)

丁：我是覺得還好啦，反正有的課沒聽到也不會影響成績呀(G1-1-3)。

若根據學生的說法，反正被拿來使用的課並不重要，對他們的學習並沒有影響。那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不重要」的課，卻還要到補習班再「額外」花時間上課，這種「因果錯置」的奇特現象，實在值得教育人員深思其背後真正的意涵。否則就如同黃毅志與陳俊瑋(2008，頁 144-145)的研究中提醒家長及學生「過多的補習帶來過度的疲勞，反而會降低學測總分」，我們可以捫心自問：付出這麼多的金錢、時間、心力，值得嗎？

### (三)補習班所學比學校有幫助

補習班如果是升學主義下的產物，它的設立宗旨當然是為了幫助學生考取理想的高中，另外的目的則應該是幫助學生應付學校的考試。然而補習班的老師對於上課不僅有自己的一套教法，而且還讓學生覺得補習班教的比學校老師教的還易於理解。學生表示：

吳：在補習班，數學老師會出一些題目讓我們搶答，還有獎金…有趣多了…(B1-1-4)

丁：在補習班，英語老師會講文法、句型，然後讓我們練習，我比較能理解…(G1-1-4)

補習班上課的進度通常都比學校快，而且對於學生的問題會給予個別的解答。因此，學生大多認為補習對他們是有幫助的，成績確實有進步，就算考試名次維持一樣，甚至略有下降，他們還是認為「不補一定更慘」，而那些沒有補習的學生也認為，如果有補習，「成績可能會好一點」。而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受到參加課後補習學生的影響。以下為觀察發現：

丁生對廖生說：誰叫你，叫你跟我一起去補你就不要，考那麼差…(M-2-4)

廖：我也想補習呀…(M-2-4)

學生表示：

廖：自從不補習，名次一直掉，好爛…(B2-2-1)

楊：第二次還是維持第五名呀…不補一定更慘…(B1-2-1)

許：幸好第一次定考後就有補習了，現在都有進步了…(B1-3-2)

對於這些學生而言，補習班的重要性似乎已凌駕於學校之上，然而多數受訪學生(許、楊、廖、吳、丁、游、高、鄭生)卻仍然表示「學校比補習班重要」。

綜上所述，學生一方面對於補習班抱持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卻也認為「學校比補習班重要」，二者之間存在著他們尚未察覺到的矛盾，只是如果對照前述資料中，學生會利用學校上課或下課時間寫補習班作業、準備補習班考試，且認為補習班教的比學校老師教的還易於理解的種種情況來看，我們不禁懷疑：學校比補習班重要，這句話是真的嗎？

反過來說，如果「補習班所學比學校有幫助」為真，那些想要送小孩去補習又無法支付學費的家庭，會不會變成教育機會均等的表象下不均等的「犧牲者」？

#### 四、「基測」是學校課程安排下學生對於課程分類及詮釋的依據

這些穿梭於學校與補習班之間的七年級國中生，對他們而言，學校課程是什麼？是一個一個在功課表上的「科目」，是升學考試的項目，還是…？從進入學校到離開，國中生待在學校的時間長達九~十小時，在學校的安排及規劃下，他們究竟如何「詮釋」課程？以下分為「對於課程的分類」、「對於課程的詮釋」及「學生的經驗課程」三部分加以描述。

##### (一)對於課程的分類

在這些參加補習的孩子們心中，課程與考試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連帶關係。早在學生進入補習班之前，就清楚自己的目標為何。學生表示：

許：唸書才有出息呀，否則我媽說難道要像她一樣…一大早到市場賣菜，苦哇(B1-3-2)

丁：…沒辦法，要升學啊！為了唸這所國中，我媽從我國小就把戶口遷來，就是要我好好唸，考上像樣的高中…(G1-1-2)

想要考上好學校，就要有好成績，而「基本學力測驗」就成為最重要的關卡。基測考試的科目，包括：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還有新近增加的作文，也就成為學生心目中最重要學校課程；這也可以從學生補習科目的統計資料中看出端倪。然而，雖然都是基測考試的科目，但因為科目性質的不同，重要程度也有差異。具體而言，學生將學校的課程作如下的分類。

##### 1.基測要考的科目

以「基測考不考」作為課程分類的依據，自然是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從學生補習的科目，可以瞭解基測的絕對重要性。學生表示：

王：主科如果不補，那幹麼補習啊，反正基測又不考…(G1-2-3)

劉：…我不補，可是同學都一定補兩大隻雞：「英」雞與「數」雞… (B2-1-2)

基測要考的科目通常也是「需要補習的科目」，像：數學、英文、國文、生物、作



文等。不過有些科目在學生看來，似乎比較不重要，雖然都是基測要考的科目，但或許是覺得「背一背」就可以了，故屬於「不需要補習的科目」，像：歷史及地理等。學生表示：

吳：沒聽過補地理、歷史的，那不是「背一背」就可以了嗎？…(B1-1-4)

因此對於九年一貫課程七大領域的分類方式，學生自有看法與主張。結果一再宣稱重視學生生活經驗與科目統整的課程，對於學生而言，其實受到「基測考不考」與「需不需要補習」的影響甚鉅，連帶使得科目統整的七大領域，被考試這把刀硬生生切成一塊、一塊又一塊。

## 2.基測不考的科目

觀察學生在生活中的用語或從訪談中，雖然未發現學生使用「基測不考的科目」一詞，但因為這些科目與基測要考的科目有明顯的區隔，主要的目的並非為了「升學」，故仍將學生提到的科目歸為一類，包括體育、表演藝術、社團活動、班週會、自習、國際展望、交通捷運等。而這些「基測不考的科目」與基測的關聯為何？像班(週)會、自習課，通常被老師拿來上基測要考的科目或考試。學生表示：

楊：班會？每次都在考試…然後我就將班會紀錄寫好交到學務處就可以了…(B1-2-3)

高：你不知道嘛？自習課就是考試課，考試、考試、考試…(G2-1-1)

至於國際展望、交通捷運等學校的「特色」課程，其實就是數學、英語老師上課的「延伸」，國際展望就是英語課，而交通捷運則是數學課。學生表示：

丁：(笑)「特色」課程？我本來以為「國際展望」會學什麼各國語言、人文特色…結果是英語老師上英語課…(G1-1-2)

另外表演藝術、社團活動則是學生非常期待的課程，這些課提供學生在上基測要考的課程以外，一個不須擔心考得好不好，可以盡情發揮與表現的舞台。學生表示：

葉：我最喜歡社團課了…我們上星期還去跟台大、輔大的比賽……(G1-4-2)

蔡：…星期一下午第二堂上表演藝術…來看我們表演喔…(G2-2-2)

最後提到的是體育。與一般研究呈現出的結論不同的是，學生因為討厭體育老師，所以並不喜歡上體育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在體育活動中仍然得到發洩體力、聯誼交流的機會。學生表示：

廖：體育老師很會訓話…不過，至少我可以在體育課表現一下…(B2-2-1)

綜上所述，這些「基測不考的科目」，往往被主科(英、數等)老師利用作為與基測有關的課程延伸活動，這樣的課程安排，也讓部份學生覺得不滿，不過在這個升學至上的大環境中，並未引起什麼樣的反抗行動。然而在 Willis(1977)的研究中發現，lads 認為學校課程是無用的，也因此形成非正式團體及抗拒的行動。兩相對照之下，名譽國中七年 A 班的這群學生，似乎並未「洞察」到學校、教師、課程及考試等對他們造成「壓迫」，所以，他們只是以發牢騷、吐苦水宣洩不滿罷了。

## (二)對於課程的詮釋

由於學生對於課程性質有不同的認知模式，因此也發展出不同的理解方式，自然也有不同的詮釋角度。那學生所建構出的課程圖像為何？以下僅以科目分類為基礎，分為幾個部分加以討論：

### 1.需要抄筆記、畫重點的課

每到了國文、生物課，就可以看見學生拿出筆記本猛抄筆記，或是在課本上註記重點的景象。以下為觀察發現：

學生在上課時拿出筆記本抄寫老師在黑板上寫的重點，呈現出難得的安靜景象(C-1-6、B-1-5)

學生表示：

鄭：這是便利貼，表示重要…國文及生物課的筆記很重要，我把老師寫在黑板上的重點抄起來，還有，老師如果說很重要的，我也會記起來(B1-4-3)。

照理來說，除了國文、生物課以外，學生應該也有需要抄筆記、畫重點的課，不過依照學生的說法，因為國文、生物老師會將重點做很好的整理，而且考試前只要好好地看上課抄的筆記及畫的重點，通常就可以考到不錯的分數。學生表示：

許：我覺得生物老師在黑板上畫的圖對我很有幫助…(B1-3-2)

劉：…考前一定要看筆記，否則…(B2-1-2)

綜上所述，學生藉由國文、生物課的筆記，可以很快掌握到考試的重點，且考到不錯的分數，這樣的課就像 Becker、Geer、Hughes 與 Strauss(1961)的研究中所謂的「餵食的課」，它們並不是「正餐」，它們是「點心」，趕快吃一吃，吃完要準備吃「正餐」了。

### 2.考不好會被打手心的課

數學及英文課是基測要考的科目，也是絕大多數學生都在補習的科目，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被歸屬於「重要」的學科，老師需要不斷地講解，學生也把這些科目當成是「主科」。學生表示：

葉：上數學及英文要專心，也要小心……(G1-4-2)

因為數學及英文課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理所當然地，任課老師「應該」處罰未達考試標準的學生，以免因落後太多而跟不上同學。於是，「打手心」，就成為處罰的最佳手段。學生表示：

廖：老師很機車，考不好就要打…他們不知道不能體罰嗎(B2-2-1)？

而且依照成績高低不同標準，被打手心的數目也不一樣。通常老師會依照分數高低來發考卷，如果家長有特別交代要「嚴加管教」的學生，老師也會予以特別的「關愛」。學生表示：

葉：有一次老師說「沒 100 分站起來，錯一題打一下」但是輪到我的時候，就說：「你爸爸要我嚴格一點」然後重重的打我的手，痛死了…(G1-4-2)

綜上所述，相較於其他「主科」對於學生考不好的處理方式，數學及英文課就是以打手心來處罰考不好的學生，因為學生對於「體罰」的畏懼，也使得數學及英文在「主科」中的重要地位一再受到負增強。

從以上學生對於課程的詮釋可以發現，這群學生在考不好會被打的社會環境脈絡中，會想方設法地讓自己不被處罰，就像 Becker (1993) 的研究中，醫學院學生只想在最有限的時間中，以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學到最多的知識一般，二者都是學生與所處環境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 (三)學生的經驗課程

對於名譽國中七年 A 班的學生來說，他們所經驗的課程幾乎與考試畫上等號，然而此種「小考、大考」不斷，並且發生在真實教學場域中的「考試領導教學」情況，不僅與當時學者專家與政府部門所規劃的「九年一貫理想課程」本意相去甚遠；也與教育部制訂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正式課程」目標有著十萬八千里的距離，更與教師、家長或其他人對「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正式課程」詮釋與認定的「知覺課程」有著嚴重的落差；尤其是在教學現場實際執行「運作課程」的教師，他們想要傳達給學生的學習內容，究竟學生吸收了多少，又轉化成怎麼樣的能力，實在令人抱持懷疑的態度 (Goodlad, 1979)。學生表示：

劉：…九年一貫課程？有什麼差嗎？反正，考就考吧，習慣就好啦…(B2-1-2)

廖：…國中很無聊，老師每次都碎碎念，不好好讀書，看你們怎麼考上建中北一女…哇 咧，我有說要考建中北一女嗎？(B2-2-2)

在這種「課程等於考試」的學習環境中，非考科雖然對「未來」沒有直接幫助，但是學生對於這些課程卻是充滿著期待，而這些學生對於部分課程被挪用於複習及加強主科之用，雖然覺得很無奈，但是卻又覺得「有其必要性」。於是，學生就在升學主義的制約下，對於學校課程有著既認同又排斥的矛盾心態。

##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從上述呈現的資料分析，有幾個可以加以討論的問題：

第一，在臺灣特有的升學文化脈絡中，七年 A 班的這群學生都知道自己是為了升學而進入名譽國中就讀，雖然並非每個學生都想唸「明星高中」，但是，上一代灌輸或耳提面命地告訴他們「考上好學校，才能找到好工作，以後才會有前途」的觀念確實已深植心中，於是他們也甘於「每週花 4-10 小時補習」、「定考前二週每天最多有五科以上的考試」、「數學及英文課考不好要被打手心」、「班週會、自習、國際展望、交通捷運等課被挪為考試及上數學、英文之用」等學校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起來學生似乎只能選擇「逆來順受」，但是學生會以「找樂子、看漫畫、玩遊戲」等方式來增加學校生活的「趣味性」，也藉此和同儕發牢騷、吐苦水以宣洩內心的不滿。不過這群多數來自中上社經地位家庭的孩子，似乎總是盡可能地努力適應學校及老師的規定，並不會公開質疑這種「不合理」、「不合規定」之處。

第二，從受訪者的社經背景資料來看，參加補習的學生多數來自中上社經地位的家庭，而定考在班上前十名者，家長職業大多為中小學教師、醫師、律師及企業主管等，這些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本及文化資本的學生，甚至於未來也會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Bourdieu,1986)，雖然本研究無法直接證明補習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性，也未追蹤這群學生國中畢業後究竟考上哪些學校，但是若從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可以發現擁有較多經濟資本及社會資本的家庭確實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由此也可以看見弱勢階級或性別學生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市場極大化下教育機會不均等的處境。

第三，無論是否參加補習，受訪學生大多認為補習對他們是有幫助的，因為「不補一定會更慘」，這樣的預期心理，也顯現於學生在考試競爭比排名的生態環境中所抱持的「至少我還有補習，否則會更差」的心態。然而卻也產生了「補習班與學校孰輕孰重」、「補習班老師與學校老師誰比較會教」的問題，弔詭的是，學生的回答似乎與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有矛盾之處，因為受訪學生認為「補習班老師比較會教」，但卻是「學校比補習班重要」，研究者認為這其中的矛盾，正反映了「升學至上、考試掛帥」的教育環境中，「解答技巧」與「考高分」遠比學習到任何美好的知識都來得重要的奇怪現象，而能夠滿足這種市場需求的正是補習班老師，這也造成學生認知上的錯亂，因為「學校應該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但學生卻必須面對「補習班老師如果真的比較會教」，那「我們又為什麼到學校讀書」的疑惑，不過這疑惑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中，恐怕不太容易找到答案，無怪乎學生會產生「現實與理論不一致」的矛盾。

第四，受訪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分類及詮釋，其實就是圍繞在「基測」這個原本只是為了鑑別國中生可以上哪一種類型高中職的入學制度，於是，學生不關心學到了什麼，只關心「基測考什麼」，不在乎增加了多少實用的或抽象的知識，只在乎「這些知識對於考試有沒有幫助」。本研究發現，不僅呼應了教改前後相關研究的結果，我們更可以進一步從這些學生的「經驗課程」得到啓示，如果主政者、參與教育政策制定者及教育改革發動者還是自顧自地，以為如何如做就一定幫助我們的下一代，那將會使得

教育政策制定與執行之間的落差永遠存在。

第五，本研究於 2010 年至 2011 年所進行，正是在教育改革發動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與「多元入學方案」等重要教育措施後加以檢驗成效的時機，但是研究者卻在教育現場看到「扭曲變形」的九年一貫課程，而原本期待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可以減輕的孩子升學壓力與課業負擔，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學生的升學壓力與課業負擔不減反增，且體罰及考試的次數也未曾稍減。當研究者看到這一群孩子活在「國家、社會、學校及家庭所共同建構的升學主義圖像」之中，日復一日的重複著聯考尚未廢除前，研究者也曾親身經歷過的教育模式，那，又有誰可以告訴這群孩子，他們還能有更好的選擇嗎？

## 陸、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從本研究的發現及前述討論中，我們看見這群身處高社經地區、就讀高升學率明星學校的國中生，在追求相同目標、看似同質性高的表相下，其實也存在著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資本不同的差異性。他們雖然認同「考上好學校，才能找到好工作，以後才會有前途」的傳統觀念，但是在缺乏相關資本的奧援下，並非每個學生都能依循此公式而獲致成功。

他們努力地活在「國家、社會、學校及家庭所共同建構的升學主義圖像」之中，並甘於來回穿梭於學校、家庭及補習班之間，還得面對一大堆的考試及考不好會被打手心的處罰等學校生活方式。他們並未出現反抗學校的行為，只是以「找樂子、看漫畫、玩遊戲」等方式來增加學校生活的「趣味性」，也藉此和同儕發牢騷、吐苦水以宣洩內心的不滿。

學校課程對他們而言，幾乎與「基測考不考」畫上等號，在基測要考的科目中，數學、英文、國文、生物等皆被視為「主科」，通常也是「需要補習的科目」，也因為補習的重要地位，反使得學校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搖搖欲墜。

最後，我們可以思考的是，臺灣的升學主義歷經高中聯考廢除及高中職的入學制度改革後，不僅未見消除，反而更加地茁壯，並與補習形成利益共生體，也讓學生的國中生活就在升學主義與課後補習的交互影響下，逐漸被「考試化」，甚至於也變成另一種補習班生活的縮影。身為教育人員，我們必須認真看待此一問題，並儘可能提出解決的策略或可行的模式。

### 二、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討論及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 (一)教育政策制定者必須正視升學主義在臺灣固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所形成的盤根錯節的結構，從不同層面並以多管齊下方式，提出有效解決的策略

對於臺灣長久以來的升學主義所造成的諸多弊病，政府所提出的政策解藥就是「多元入學方案」，也期待藉由入學制度的改革減低學生的考試壓力，然而，學生為了應付不同版本的課程及多元的入學方式，反而讓補習現象變本加厲，加上相關研究發現文化

及社會資本高者的升學機會明顯優於低者，故批評多元入學不公的聲浪四起，且廣設高中及大學後，社會各界對於教育品質降低憂心忡忡，益加使得家長對於學生進入明星高中、公立大學的期待有增無減(陳建州、劉正，2004；陳怡靖，2004；林俊瑩、黃毅志，2008)。

在前述政策尚未降低社會各界疑慮之際，政府又積極推動以「會考」取代「基測」的改革措施(教育部，2013)，雖然政策立意良善，然而臺灣升學主義的形成與演變，其源頭可追溯至我國歷經千年的科舉制度(周愚文，2008)，故其在臺灣固有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所形成的盤根錯節結構，需要政府更加費心地整合學界、實務界、社會各界人士及媒體的不同看法，並應邀請學生來共同對話，以期從不同層面並以多管齊下方式，提出有效解決的策略，才有可能讓升學主義的魔障逐漸消失，並建立民眾對於政府改革高中入學制度公平性的信心。

而徹底解決之可能途徑，是政府帶頭打破大學以降各級學校的排名迷思，破除明星國中、明星高中與明星大學，讓教育制度完全回歸到學生主體性，重視學生的差異性與共同性，讓學生的才能配合學校發展的特色得到發展的機會。進而讓社會大眾及媒體聚焦於學校的特色發展及學生的各種表現，藉由整體氛圍的塑造，再試圖去鬆動根基穩固的升學主義，如此或許有機會改變升學主義所造成學校教育畸形發展的各種現象。

(二)課後補習已成為學校以外國中生生活的一部份，相關單位必須留意參加課後補習學生身心調適及課業負擔，以及弱勢學生學習不利等問題，並提出因應策略

爲了獲得更好的文憑、謀得更好的工作、進入更好的學校，參加課後補習似乎已成爲一種入門必備的基本條件，不僅造就出補習市場的龐大商機，同時也讓國中生就讀補習班的昌盛繁榮景象，隨著教育改革的更迭更加蓬勃壯大起來。

然而在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下，各家補習班藉由在學學生資料的取得、學長姐拉學弟妹、獎金發放、傳單發送、電話的強力攻勢及各種升學數據的宣傳等商業手段，再加上變動不安的教改政策影響下家長及學生惶惶不安的心理因素，促成了學生「在放學後比上學還要忙碌」的課後補習盛況。更令人擔心的是補習班之間不斷上演的「搶人大戰」戲碼及「過度學習」所造成學生的「身心俱疲」現象等種種問題(邱永富，2002)。因此，相關單位對於補習班的定位與發展必須加以通盤檢討並有效管理，以防止市場機制下過度的惡性競爭，戕害國中生的身心發展。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身處不利地位的弱勢階級，卻也往往因無法提供孩子額外或足夠的經濟奧援，以致於孩子可能因此而喪失成功或翻身的機會，雖然相關單位已挹注資源在提供弱勢家庭獎助金及補救教學等各種方案，且研究也顯示，讓弱勢階級學生的學習不因寒暑假而中斷，有助於提高其學習成就(王麗雲、游錦雲，2005)，但是弱勢階級學生的處境卻也在整體社會結構中顯得更加地不利，如何從社會結構中找到突破的方法，以彰顯孩子的主體性，確實需要有關單位費心思量，並提出有效的因應策略。

(三)學校及教師必須認真看待學生經驗課程的差異性與主體性，並檢視學校制度中不合理處，教師更應與學生共構課程與教學新模式，以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從本研究中我們看到學生經驗課程所具有的差異性與主體性意義及其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學校及教師必須認真看待並給予善意及正面的回應，切勿只是輕率以「偏

差行爲」加以處置而已，更應該藉此檢視學校制度中不合理處，讓學生得到真誠、有尊嚴及合理的對待。

而教師面對學生對於課程詮釋的差異性時，應該站在同理的立場，給予最大的尊重與包容，在師生共同努力之下，相互提出不同的見解與看法，並反思自身的立場與處境，以跨越既有經驗所形成的疆界，經由不斷地解構、建構、再解構、再建構…等動態過程，生產出屬於學生的有意義的文化。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文獻

- 天下雜誌(2013)。十二年國教 問題在沒有配套。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9470&page=3>
- 王震武、林文瑛(1994)。升學制度與升學症候群。載於臺灣研究基金會(主編)：臺灣的教育改革(頁 502-539)。臺北市：前衛。
- 王麗雲、游錦雲(2005)。學童社經背景與暑期經驗對暑期學習成就進展影響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4)，1-41。
- 白潔瑩(2008)。學生的課程詮釋--以建中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學生為例(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臺北市。
- 吳瓊洳(2000)。國中學生反學校文化之研究(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臺北市。
- 巫有鎰(2007)。學校與非學校因素對臺東縣原、漢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7(1)，29-68。
- 李政釗(2011)。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美、日、台個案研究(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臺北市。
- 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以家庭資源為分析架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1-43。
- 周愚文(2008)。科舉制度中三個重要問題的現代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4(1)，1-14。
- 林大森(2002)。高中職、公私立分流與對地位取得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25(1)，149-177。
- 林大森、陳憶芬(2006)。臺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2(4)，35-70。
- 林志成(2007)。錄取率破 96% 11 分也能上大學。取自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1+112007080900033,00.html>。
- 林忠正、黃瑾娟(2009)。補習文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1(4)，587-643。
- 林金葉(2010)。臺北市公立高中學生對公民與社會科的課程詮釋(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臺北市。
- 林俊瑩、黃毅志(2008)。影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程模式的探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45-88。

- 武曉梅(2004)。成人學生的補校教育觀——一個國小補校班級的民族誌研究(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臺北市。
- 直轄市及各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2013)。全國統計。取自 <http://bsb.edu.tw/>
- 邱永富(2002)。補習班之服務品質：以屏東縣某立案補習班為例(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高雄市。
- 張芬芬(2010)。質性資料分析的五步驟：在抽象階梯上爬升。初等教育學刊，35，87-120。
- 張郡雯、林文瑛(2003)。升學主義還是升學機會？升學壓力的社會意涵。教育心理學報，35(2)，167-182。
- 教育部(2007)。政策措施。取自 <http://www.edu.tw/index.htm>。
- 教育部(2009a)。大專校院概況。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http://www.edu.tw/statistics/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 教育部(2009b)。大專校院畢業生人數。取自 [http://www.edu.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http://www.edu.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 教育部(201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取自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7>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台灣社會學刊，19，96-137。
- 陳怡靖(2004)。臺灣地區高中多元入學與教育階層化關聯性之研究(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高雄市。
- 陳靜怡(2008)。國中學生對國語文課程詮釋之研究：以一所鄉村學校為例(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嘉義市。
- 陳建州、劉正(2004)。論多元入學方案之教育機會均等性。教育研究集刊，50(4)，115-146。
- 黃武雄(2003a)。學校在窗外。臺北縣：左岸文化。
- 黃武雄(2003b)。教改怎麼辦？教改的架構與菁英思維(上)。教育研究，106，53-56。
- 黃政傑(1994)。我國公元兩千年高級中等教育改革方向之研究。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 黃政傑(2012)。課程設計。臺北市：東華書局。
- 黃毅志(2000)。文化資本、社會網絡與階級認同、階級界線。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0，1-42。
- 黃毅志(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49(4)，1-31。
- 黃毅志、陳怡靖(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1)，77-118。
- 黃毅志、陳俊瑋(2008)。學科補習、成績表現與升學結果——以學測成績與上公立大學為例。教育研究集刊，54(1)，117-149。
-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北市：學富文化。
- 劉正(2006)。補習在臺灣的變遷、效能與階層化。教育研究集刊，52(4)，1-33。
- 劉國兆(2009)。國中生的學校生活適應策略與同儕文化之研究。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23(2)，167-185。
- 歐用生(1985)。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12，91-125。



- 蔡榮貴、林士乾(2006)。國小五年級課堂內師生權力關係之研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6(1)，109-147。
- 蔡碧峰(2008)。升學氛圍下國中學生的課程觀：一個班級的民族誌研究(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臺北市。
- 關秉寅、李敦義(2008)。補習數學有用嗎？一個「反事實」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41，97-148。

## 二、英文文獻

- Apple, M. W. (1990).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 S. (1993). How I learned what a crock w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8-35.
- Bourdieu, P.(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pp. 241-260). Connection: Greenwood.
- Bray .M.(2003).*Adverse Effects of Supplementary Private Tutoring: Dimensions, Imp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Paris: UNESCO-IIEP.
- Fouts, J.F. (1989). Classroom environments and student views of school studies: The middle grades.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 17(2), 136-147.
- Goodlad, J.I. (1979).*Curriculum inquiry: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practice*. New York: McGraw-Hill.
- Ogbu,J.U.,&Fordham,S. (1986). Black students`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burden of ‘acting White’”.*The Urban Review*,18(3),177-206.
- Schmidt, L. J. (1992).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control ideology and the quality of school life. *Journal of invit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1 (2), pp.103-110.
- Schug, M. C., Todd, R. J., & Berry, R. (1984). Why kids don't like social studies. *Social Education*, 48, 382-87.
- Wexler, P. (1992). Becoming somebody: The class self. In P. Wexler, C.Warren, K.June,& M.Rebecca(Eds.), *Becoming somebody: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school*(pp. 128-146). New York: Falmer.
- Willis, P. (1977).*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Collumbia University Press.Young, M. F. D. (1971).*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London:Collier MacMillan.

投稿日期：2013年01月28日

修正日期：2013年06月20日

接受日期：2013年09月25日

# **Diplomaism, School Campus Life, and Cram Schooling: A Group of Seventh Grade Student's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Liu Kuo-Chao

Dep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hD

##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lation among diplomaism, school campus life, cram schooling, and the impact of which on the course interpre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diplomaism w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acts on the school, families, and society. The school life mode of students mainly revolved around the evasion of examinations and “having fun”. And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ampus tutorial culture and peer relationships,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cram school has more weight than their classes in school. And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on which students anchor their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t is apparent that diplomaism has deep-rooted impacts on the students' liv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conclusions and proposals to provide significant clues and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work of individuals engaging i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researchers of student culture.

**Key words:** diplomaism, school campus life, cram schooling